

飲冰室文萃

梁启超 著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天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天津古籍出版社

梁启超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著.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3

ISBN 7 - 80504 - 978 - 5

I . 中... II . 梁... III . 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时清时代 IV . B2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4932 号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梁启超/著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宏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125 字数 262000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7 - 80504 - 978 - 5

定 价:22.00 元

编 辑 说 明

梁启超是闻名中外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学术大师,其著作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我们从梁启超一千多万字的著述中,精选体现其文化观和学术思想的珍品,作为“饮冰室文萃丛书”,分册出版。首次推出的是近代文化史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清代学术概论·儒家哲学》。

本丛书编校原则如下:

一、原著出版于 20 世纪初期,内容、结构及语言文字自有其时代印痕。此次编辑出版,原则上一仍其旧,一般不作改动,以存原貌。

二、由专家选择初版本或好的版本。

三、改为横排简体字本,采用现行分段形式及新式标点。

四、文字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范,但简化后易引起歧义的字词、具有时代特色及作者语言习惯的字词则不作改动。

五、数字一般遵照原著的用法。

六、独立成段的引文变换字体缩格排印,原双行夹注改为单行小字夹注。

七、原著中确系误写、错排的个别文字,经与几种版本参照核校,予以改正。

本书原稿由元青教授提供。

序 言

天津古籍出版社在大力编辑出版《梁启超全集》的同时，又及时推出“饮冰室文萃丛书”，选择梁启超那些富有学术价值和创新思维，且经过近百年的历史检验，仍熠熠生辉的学术专著重新标点、校对、排印，让优秀的文化精品再展风姿，为推进学术研究，提高国民素质和文化品位发挥作用，实在是值得提倡和庆祝的一件大好事。

梁启超一生著述宏富，涉及面广，对史学、文学、政治学、哲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新闻学等方面都有开拓性的研究，是典型的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现存的《饮冰室合集》近一千万字，如果加上书信和散失的其他文论，一千四百万字是应该有的。概观梁启超的论著，除诗歌小说之外，大体分为两类：一是以报章文体写的针对时局的各种政论性文章；二是以学术语言写的研究中外历史和文化的学术专著。1932年梁启超的好友林志钧编辑《饮冰室合集》时，将梁的第一类文章编为文集；第二类文章集为专集。这种分类是颇有见地的。但无论文集、专集，从梁文的字里行间都可以感悟出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这就是情理性和现实感。

梁启超是性情中人，勇于和善于用情写作，人们称其“笔尖常带感情”，是很真切而形象的。这种情，包括对祖国的热爱，对专制集权的痛恨，对贪官污吏的憎恶，对社会改革的热情，对学术文化的珍爱，对妻子儿女、亲朋好友的亲情等，一个“情”字，是阅读梁启超文论的基础。不过，梁启超的情，是完全建立在“理”的基础之上的，往往是情

中有理，理中传情，其文章之所以感人，情理交融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而且梁启超所讲的理，大都顺应时代潮流，合乎民众需求，代表了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总体趋势，其读者群的与日俱增就自在情理之中了。他写的《少年中国说》，真是激情澎湃，豪情满怀，读了没有不为之震撼的；他著的《袁崇焕传》，真可谓知人论世，心系英雄，读了没有不拍案叫绝的；即使是《戊戌政变记》这样的历史专著，也是在倾注了对维新变法一片深情的基础上，痛定思痛，悲愤交加，以其切身的历史体验，按史书的格调写就的。如果再看看他那些演讲、笔记、大学讲稿、给妻子儿女的家书，则更突显出梁启超火热的情，炽热的爱，以及率直而令人信服的哲理。

梁启超的所有论著都是有感而发，无病呻吟的作品基本与其无缘。现实感是把握梁启超文论的关键。早年他投身变法维新，其论著基本随着改革的脉搏跳跃。流亡海外后，他不仅关注国内政治与社会文化的动向，而且依托世界，捕捉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渐渐就把中国与世界、政治与经济、社会与人生、学术与文化等结合起来思索，故其文论广泛而几乎无所不包，激进而几乎涉及时局的方方面面，展现出一个先进中国人走向世界后的海纳百川的胸襟和不断进取的追求。梁启超在思想文化上的成名，主要是在这期间奠定的。1912年后，受其沉浮于民初扑朔迷离的政治所制约，其论著和当时的历史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1918年后，梁启超退出政坛，在天津的饮冰室读书写作，在研究中国古典文化上独辟蹊径，成果卓著。他的一批影响深远的学术专著多在这期间写就。“饮冰室文萃丛书”所选的书目也多是这些著作，首批推出的《清代学术概论·儒家哲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就是1918年后的作品。值得指出的是，即使是这些严肃的学术专著，也体现了梁启超结合现实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思想文化追求，深层次地反映出其心灵与现实的互动。为了让读者能比较准确地掌握梁启超晚年论著的精神实质，有必要探讨一下其1918年后的文化心态。

梁启超生命的最后10年,即1919到1929年,就文化观来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前30年间引进西方文化为主的一贯思路不同,他提出“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3,第55页)这种调和东西文明的思想文化主张的出现,是梁启超在反思过去30年如梦般的政治生涯的基础上,尤其是结合1919年到欧洲一年多的实地考察后,深思熟虑,提炼升华的结果。

梁启超参政热情很高,但从来都不得志。戊戌变法的失败,虽然没有丝毫减弱他的政治斗志,但被清兵追捕的逃亡滋味着实让他心惊肉跳。民国建立后,他组党结社,在议会政治的漩涡里周旋,但总是被人利用,难遂心愿。先是上当于袁世凯,后又被段祺瑞算计,做过财政总长、司法总长等大官,却疲于应付,一无所成。1918年他被迫退出官场时不仅对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完全失去了信心,而且对西方文化发生了动摇。于是决心到欧洲亲自考察一番,看个究竟。从1918年12月28日到1920年1月23日,梁启超和丁文江、张君勱、蒋百里等7人先后访问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和德国,在法国和英国停留时间最长,参观了工厂、学校、银行、博览会、教堂、议会、市政府、剧院、商会、各种社团、名人故居、古战场和“一战”的据点、著名的风景区以及一般平民的家庭,还发表演说,交流学术,结交了许多朋友;同时涉足了正在巴黎召开的“巴黎和会”,亲眼目睹了列强的勾心斗角。真可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对政治迷茫后心灵苦闷的梁启超,在思想文化上找到了新的奋斗目标。综合梁的切实感受,一是欧洲不愧为西方文化的发源地,源远流长,底蕴深厚,思想自由、个性解放、科技发达、政治有序,具有法治传统,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国民素质和社会整体水平不可与中国同日而语;二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正面临着深刻的社会危机,经济衰退,物价昂贵,煤炭“都比金子还贵”,冬天供应不了暖气,而且两极分化严重,工人罢工,民众示威,社会革命暗潮涌动;三是“科学万能”走到了极端,将社

会给“物质”化了，“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结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引发了“精神饥荒”；（《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3，第11页）四是欧美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对西方社会文化发生了动摇，迫切地想从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中寻求救助的办法。他们不失时机地邀请梁启超介绍孔子、墨子和老子、庄子的思想，一位美国著名的哲学家还劝梁回国后少研究西学，多引导青年去探讨孔、老、墨的学说，好来解救日渐没落的欧洲，这令梁启超极为震惊。由此梁突发奇想，何不以西方的物质文明去解决东方的经济落后，以东方的精神文明来补救西方的精神饥荒，“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饥荒，在东方找材料”，（《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时事新报》1923年1月20日）二者合二而一，创造第三种文明。梁启超形象地称之为中西文化“结婚”。当梁启超1920年返回中国后，即全力以赴去创建他心目中的第三种新文明。具体办法是，以中国古典文化为载体，引入西方文化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运用现代理念重新诠释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使之与西方文化化合，“返本开新”，形成一种新文化，为全人类做贡献。梁启超就是怀着这样的思想文化心态，开始了晚年的学术研究。《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和《儒家哲学》也是在这样的特定心路当中写成的。

《清代学术概论》写于1920年冬，仅半月成书。梁的好友蒋方震（百里），是和蔡锷齐名的清末民初的著名军事家，考察欧洲归来后，著有《欧洲文艺复兴与时代史》，恭请梁作序。梁认为清代的学术思潮在许多地方与欧洲文艺复兴相似，写序时大加发挥，广泛评述，无法止笔，一下子多至5万余言，已不成序，遂单独成书，名《清代学术概论》。蒋方震反过来又为梁书作序。蒋在序言中，一方面肯定了梁此书的功力深厚，论辩超群，具有启蒙意义；一方面又提出了晚清科技意识不浓，致用学风不够，“人欲”自由没有发挥的空间以及西方文化难以在中国确立等问题，梁书都没有透彻地解释。从总体上看，《清代学术概论》仅是纲要式的论著，很多问题没有展开，可补充的东西不

少,但它精炼而高度概括,简明而线条明快,人们一眼就可以触摸到有清一代的学术主潮和基本特征,同时在研究方法和理念上颇有创新,是以现代思想文化为指导研究传统学术史的佳作。梁以后的学者,基本是按照此书的框架和思路作进一步研究的。

如果说《清代学术概论》是有关清代学术发展的一部纲要,那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是十分翔实的专著了。后者近30万言,从明代的最后20年讲起,直到1920年为止,恰好三百年,梁启超不起名清代学术史,原因有二:一、“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把最近三百年认作学术史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恰当,所以定名为近三百年学术史”;二、“今年是公历1923年,上溯三百年前之1623年,为明天启三年,这部讲义,就从那时候算起,若稍为概括一点,也可以说是17、18、19三世纪的中国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第75,第1页)总之,为求清代学术发展的完整性,梁启超适当前后延伸,运用崭新的文化理念,从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上阐述三百年间的学术起伏、流变,不但较《清代学术概论》丰满多了,而且产生了一些新观点。

《先秦政治思想史》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样,也是在讲义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1922年春,梁启超应北京政法专门学校之请,讲授先秦政治思想史,虽然只有四讲,但集中了他的主要观点,很有见地。同年秋冬,他又在东南大学讲课,将原有的四讲扩编,在基本框架不变的基础上,大大丰富了先秦政治思想的内容。梁对先秦政治思想的总体描述是:四家(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四大潮流(无治主义、礼治主义、人治主义、法治主义)、四个共同特点。梁认为,所谓的四个共同特点,就是中国人政治思想的总体特征,具体是:一、中国人深信宇宙间有一定的自然法则,把这些自然法则运用于政治领域,便是最理想、最圆满的政治思想,“顺天行事”就是这个意思。二、君权神授,君权无限,认定皇帝有绝对的权威,还加上许多神秘的色彩。三、将美好的社会和国家理想化了,什么“大同”、“天下为公”等,全是空

泛的纸上的东西，具体如何变为现实，从来不去研究，结果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乌托邦”。四、中国人讲政治，总以“天下”为最高，国家变成了具体的某朝某代，所谓“治国”、“平天下”，自然衍化成了为当权者效劳的代名词，国家究竟为何物全然不知。在这四条绳索的束缚下，中国人的政治思维很难走出封建专制的怪圈，去建设现代国家。梁启超的分析，真是高屋建瓴，入木三分。还应提及的是，梁启超之所以研究先秦政治思想，目的是提高中国人的国民意识和政治心理。在他看来，政治就是国民政治心理的写照，没有好的国民政治心理，好的政治不会从天而降。而先秦时期是中国人政治心理形成的基础，只有把那时的政治思想实质搞清楚了，才能对症下药，找到提高中华民族政治素质的良方。《儒家哲学》写于1927年。此书较《先秦政治思想史》更富有哲理。梁启超虽然不是著名的哲学家，但实践能力极强，哲学意识很浓，非常善于吸收中外哲学的研究方法和理念，运用到中国学术史的研究当中。他对儒家哲学的总体把握和具体分析都有相当的深度和独特的见解，对今天仍然有很强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李喜所

2003年3月6日于南开大学

目 录

一	反动与先驱·····	1
二	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上)·····	12
三	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中)·····	20
四	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下) 近三百年学术史附表·····	28
五	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 ——黄梨洲 附:孙夏峰 李二曲 余姚王学家 李穆堂·····	44
六	清代经学之建设 ——顾亭林 阎百诗 附:胡舄明 万充宗·····	59
七	两畸儒 ——王船山 朱舜水·····	84
八	清初史学之建设 ——万季野 全谢山 附:初期史学家及地理学家·····	96
九	程朱学派及其依附者 ——张杨园 陆桴亭 陆稼书 王白田 附:其他·····	110

十 实践实用主义

——颜习斋 李恕谷 附:王崑绳 程绵庄

恽皋闻 戴子高 121

十一 科学之曙光

——王寅旭 梅定九 陈资斋 附:其他 158

十二 清初学海波澜余录 170

十三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

——经学 小学及音韵学 200

十四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二)

——校注古籍 辨伪书 辑佚书 253

十五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

——史学 方志学 地理学及谱牒学 304

十六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四)

——历算学及其他科学 乐曲学 373

一 反动与先驱

这部讲义,是要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为什么题目不叫做清代学术呢?因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把最近三百年认做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所以定名为《近三百年学术史》。

今年是公历一九二三年。上溯三百年前至一六二三年,为明天启三年,这部讲义就从那时候讲起。若稍为概括一点,也可以说是十七、八、九三个世纪的中国学术史。

我三年前曾做过一部《清代学术概论》。那部书的范围和这部讲义差不多,但材料和组织很有些不同。希望诸君预备一部当参考。

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是:

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

无论何方面之学术,都有这样趋势。可惜客观考察多半仍限于纸片上事物,所以它的效用尚未能尽量发挥。此外还有一个支流是:

排斥理论,提倡实践。

这个支流屡起屡伏,始终未能很占势力。总而言之,这三

百年学术界所指向的路,我认为还是不错的——是对于从前很有特色而且有进步的,只可惜全部精神未能贯彻。以后凭藉这点成绩扩充蜕变,再开出一个更切实更伟大的时代,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这回演讲的微意。

凡研究一个时代思潮,必须把前头的时代略为认清,才能知道那来龙去脉。本讲义所讲的时代,是从它前头的时代反动出来,前头的时代,可以把宋、元、明三朝总括为一个单位——公历一〇〇〇至一六〇〇——那个时代有一种新学术系统出现,名曰“道学”。那六百年间,便是“道学”自发生成长以至衰落的全时期。那时代的道学思潮又为什么能产生能成立呢?(一)因为再前一个时代便是六朝、隋、唐,物质上文化发达得很灿烂,建筑、文学、美术、音乐等等都呈现历史以来最活泼的状况。后来,这种文明烂熟的结果,养成社会种种惰气。自唐天宝间两京陷落,过去的物质文明已交末运,跟着晚唐藩镇和五代一百多年的纷乱,人心愈发厌倦,所以入到宋朝,便喜欢回到内生活的追求,向严肃素朴一路走去。(二)隋、唐以来,印度佛教各派教理尽量输入,思想界已经搀入许多新成分,但始终儒自儒、佛自佛,采一种不相闻问的态度。到了中晚唐,两派接触的程度日渐增加,一方面有韩愈一流人据儒排佛,一方面有梁肃、李翱一流人援佛入儒^①。到了两宋,当然会产出儒佛结婚的新学派。加以那时候的佛家,各派都衰,禅宗独盛。禅宗是打破佛家许多形式和理论,专用内观工夫,越发与当时新建设之道学相接近,所以道学和禅宗,可以说是

① 梁肃与白居易交好,是天台宗一员,护法健将。李翱是韩愈朋友,著有《复性书》,拿佛理解释儒书。

宋、元、明思想全部的代表。

道学派别，虽然不少，但有一共同之点，是想把儒家言建设在形而上学——即玄学的基础之上。原来儒家开宗的孔子不大喜欢说什么“性与天道”，只是想从日用行为极平实处陶养成理想的人格。但到了佛法输入以后，一半由儒家的自卫，一半由时代人心的要求，总觉得把孔门学说找补些玄学的作料才能满足。于是从“七十子后学者所记”的《礼记》里头抬出《大学》、《中庸》两篇出来，再加上含有神秘性的《易经》作为根据，来和印度思想对抗。“道学”最主要的精神实在于此。所以在“道学”总旗帜底下，虽然有吕伯恭、朱晦庵、陈龙川各派，不专以谈玄为主，然而大势所趋，总是倾向到明心见性一路，结果自然要像陆子静、王阳明的讲法，才能彻底地成一片段。所以到明的中叶，姚江（王阳明）学派，奄袭全国，和佛门的禅宗，混为一家。这是距今三百五六十多年前学术界的形势。

在本讲义所讲的时代开始之时，王阳明去世已将近百年了。阳明卒于嘉靖八年，当公历一五二九年。明朝以八股取士，一般士子，除了永乐皇帝钦定的《性理大全》外，几乎一书不读。学术界本身，本来就像贫血症的人，衰弱得可怜。王阳明是一位豪杰之士，他的学术像打药针一般，令人兴奋，所以能做五百年道学结束，吐很大光芒。但晚年已经四方八面受人妒嫉排挤，不得志以死。阳明死后，他的门生，在朝者，如邹东廓守益、欧阳南野德；在野者，如钱绪山德洪、王龙溪畿、罗近溪汝芳、王心斋艮，都有绝大气魄，能把师门宗旨发挥光大，势力笼罩全国，然而反对的亦日益加增。反对派别，大略有三：其一，事功派，如张江陵居正辈，觉得他们都是书生迂阔，不切时务。其二，文学

派,如王弼州世贞辈,觉得他们学问空疏,而且所讲的太干燥无味。其三,势利派,毫无宗旨,唯利是趋,依附魏忠贤一班太监,专和正人君子作对,对于讲学先生,自然疾之如仇。这三派中,除势利派应该绝对排斥外,事功、文学两派,本来都各有好处。但他们既已看不起道学派,道学派也看不起他们,由相轻变为相攻。结果这两派为势利派利用,隐然成为三角同盟以对付道学派。中间经过“议礼”、“红丸”、“挺击”、“移官”诸大案,^①都是因宫廷中一种不相干的事实,小题大做,双方意见闹到不得开交。到最后二三十年间,道学派大本营,前有“东林”,后有“复社”,都是用学术团体名义,实行政党式的活动。他们对于恶势力拼命奋斗的精神,固然十分可敬可佩,但党势渐成以后,依草附木的人日多,也不免流品很杂。总而言之,明朝所谓“士大夫社会”,以“八股先生”为土台。所有群众运动,无论什么“清流浊流”,都是八股先生最占势力。东林、复社,虽比较的多几位正人君子,然而打开天窗说亮话,其实不过王阳明这面大旗底下一群八股先生和魏忠贤那面大旗底下一群八股先生打架。何况王阳明这边的末流,也放纵得不成话,如何心隐本名梁汝元、李卓吾贻等辈,简直变成一个“花和尚”。他们提倡的“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把个人道德、社会道德一切藩篱都冲破了,如何能令敌派人心服!这些话且不必多说。总之晚明政治和社会所以溃烂到那种程度,最大罪恶,自然是在那一群下流无耻的八股先生,巴结太监,鱼肉人民。我们一点不能为他们饶恕。却是和他们反对的,也不过

① 欲知四大案简单情节,看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最好。

一群上流无用的八股先生，添上几句“致知格物”的口头禅做幌子，和别人闹意见闹过不休。最高等的如颜习斋所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至矣极矣。当他们笔头上、口角上吵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张献忠、李自成已经把杀人刀磨得飞快，准备着把千千万万人砍头破肚，满洲人已经把许多降将收了过去，准备着看风头捡便宜货入主中原。结果几十年门户党派之争，闹到明朝亡了一齐拉倒。这便是前一期学术界最后的一幕悲剧。

明亡以后，学者痛定思痛，对于那群阉党、强盗、降将，以及下流无耻的八股先生，罪恶滔天，不值得和他算帐了，却是对于这一群上流无用的道学先生，倒不能把他们的责任轻轻放过，李刚主说：

……高者谈性天，撰语录；卑者疲精死神于举业，不唯圣道之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罔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中国嚼笔吮毫之一日，即外夷秣马厉兵之一日，卒之盗贼蜂起，大命遂倾，而天乃以二帝三王相传之天下授之塞外……《恕谷集·书明刘户部墓表后》

又说：

宋后，二氏学兴，儒者浸淫其说，静坐内视，论性谈天，与夫子之言，一一乖反，而至于扶危定倾大经大法，则拱手张目，授其柄于武人俗士。当明季世，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觉建功立名，俱属琐屑，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业也。卒至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呜呼，谁生厉阶哉！《恕谷集·与方灵皋书》